

研究系 与五四时期 新文化运动

——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 

彭 鹏 著

YANJIUXI
YU WUSISHI
XINWENHUAYUNDONG

山东大学出版社



研究系 与五四时期 新文化运动

——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 

彭 鹏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 1920 年前后为中心/彭鹏
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5

ISBN 7-306-01947-3

I. 研… II. 彭… III. ①五四运动(1919)—史料 ②研究系—史料 IV. K258.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7166 号

责任编辑:欧燕华 责任校对:中原 封面设计:方竹 责任技编:黄少伟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发行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市东下路6号 邮编:528200)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6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读大学的时候，少年不识愁滋味，总以为曾经有一个年代，那是自己生命的乡愁……于是找史书看、找诗歌读，去到“五四”，发现在那前后的十年里，竟然有许多人是可以做知音的，不知不觉，喜欢亲近那些以“底”字做“的”字的诗与文，那些文人逸事、抒情美文乃至无病呻吟，都翻得烂熟，学得极像。到了要写博士论文了，自然挑那些熟悉的人去写。可是在我写博士论文的时代，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与事好像是非是极分明的，我不喜欢在这些确定性中去重复什么，于是找了些看起来暧昧、尴尬的人与事来研究。这种研究下面的心态，未必不是一种少年时代叛逆的无意识痕迹。

现在，当年一起谈尼采、徐志摩的人均已四散，我自己也极平常地在做着学术和事功间的野狐禅，只是在不把“研究”、“出书”当成晋升、谋职的手段时，重新看自己的文字，竟然有一种纯净感。我不在意这一本书的分量，我在意自己感觉到的这种纯净。所以，当书的清样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回到了读书的年代。这时候，想起了故交、同窗，想起生命中一去不复

返的岁月，心中有一种痛，这种痛没有什么可以弥补，但我宁愿它存在。我亲爱的老师、同学、朋友，那时候曾经相敬、相昵、相怨的人们，我怀念他们，如同我依然怀念着的似水流年。

记得写完博士论文草稿的时候，看着房间里堆满的民国时代报纸、杂志的复印件，我心中只反复着一句话：“那些曾经活着的人，他们现在去了哪里？”现在看了这本书，我的疑问依然。

历史始于疑问，永无终结。

本书是博士论文，所有材料以论文完成时所见为限。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恩师陈胜彝教授。

作 者

2003年春于奥克兰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系研究的学术史	(1)
一、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对研究系的指称及简记	(1)
二、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研究系研究的概况	(7)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研究	(11)
注释	(15)
第二章 研究系渊源及其文化关怀由来	(20)
一、来自立宪运动的渊源	(20)
二、进步党	(23)
三、研究系及研究系圈子	(27)
四、《庸言》及《大中华》的文化关怀	(33)
五、政治挫折与文化运动的意欲	(43)
注释	(48)
第三章 研究系参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概况	(54)
一、研究系报刊的举措	
——从 1918 年开始	(54)
二、研究系与新文化运动中主要力量关系大略	(61)
三、讲学社个案	(66)
四、共学社及其他	(83)
注释	(92)

第四章 研究系身份与个体观念歧异	
——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及科学玄学论战 来考察	(108)
一、梁启超引起的事端	(108)
二、科学与玄学论战 ——考虑到研究系背景的一种观察	(116)
注释	(125)
第五章 蓝公武与《国民公报》	
——以 1919 年为中心	(130)
一、《国民公报》介入新文化运动之缘起	(130)
二、蓝公武与傅斯年、胡适等人的文字之交	(132)
三、对“问题”与“主义”争论的补充认识	(151)
注释	(157)
第六章 论《学灯》与 1919 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	(162)
一、《学灯》介入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162)
二、宗白华主持的《学灯》	(172)
三、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182)
四、简论《学灯》与文学研究会及《时事新报》的 《社会主义研究》专刊	(193)
注释	(197)
第七章 以《晨报副镌》为中心的《晨报》·蒲伯英 与戏剧	(207)
一、《晨报》副刊改革	(207)
二、《晨报副镌》	(217)
三、《晨报》·蒲伯英与戏剧	(220)

注释	(238)
第八章 从《解放与改造》、《改造》看研究系	(247)
一、《解放与改造》的倾向	(247)
二、从《改造》到本书结论	(257)
注释	(271)
主要参考文献	(275)

第一章 研究系研究的学术史

一、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对研究系的 指称及简记

作为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著名派别，“研究系”之名可见于大量的近代史著述中。关于研究系的渊源和流变，笔者拟在第二章详述；在本章中，我首先想回顾近代史研究领域，一般概念意义上的研究系研究。

由民初进步党转化而来的研究系，在大量关于民初政治的史著中不可避免地被提及。但是，以笔者目前所看到的关于研究系的描述中，它的存在，不过是民初编年史的一小部分，它的活动被湮没于民初复杂而混乱的政治史中，它主要用于补述进步党 1916—1918 年间的历史。而在近代所谓“思想文化史”中（在这里笔者从一般中国史学界习惯，将 intellectual history 与 Cultural history 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它除了在有关“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著述中被作为非主流因素批判而特别地出现外，五四文化史的专门研究中很少有人特别地为研究系设立章节^[1]。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政治前史以及在文化活动中始终

抱持不可割舍的政治情结，这种政治情结，使他们即使在文化运动中出现，也很容易被归入政治史；另一方面，也由于史学界向来主要地把研究系定位于“北洋军阀与民国政治”这样一个系统中，从而使它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地位受到忽视。最近十多年来，史学界已把对五四运动及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范围扩大，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及社团外，对胡适等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也颇多关注；但是，新文化运动史基本上维持以陈独秀、李大钊、《新青年》、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中心这么一种格局^[2]，研究系在作为晚清立宪党、民国初年进步党、40年代又演成国社党这样一个政治谱系中，研究者似乎不会特别关注它在文化运动中的存在与价值。因此，笔者所做的研究系研究学术史回顾，实际上是对一个很不完整的领域进行的一种搜寻。

1916年12月16日，冯国璋发表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云山童子的谈话，谓“国民党理想高尚，在人民智识程度较高之地方占优势，但与中国一般人民之心理相距甚远；进步党……主张稳健，与中国现状适合”^[3]。在这时，一般人都还是用进步党称宪法研究会诸人。一般都认为“研究系”名称得由来由“宪法研究会”，而宪法研究会正式组成在1916年9月12日^[4]。1917年11月24日，原进步党政客孙洪伊（后组韬园派）之秘书白坚武在他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自督军团肇变以来，总统退位，国会推倒，研究系阴谋拔异，段总理刚愎妄为……”^[5]在这里，白坚武于私人日记中用“研究系”一词，多少可见民国以“系”、“派”、“部”等作为一种势力指称的习惯；另一方面也可见民初政治组合之不稳定性。^[6]同年11月29日，重庆《商务日报》载《日人之中国政党观》介绍性地说明研究系的来历、与国民党的对立及当时情形：“宪法研究会乃梁启超汤化龙等纯进步党为其中坚，其中收容政友会公民党之余党，梁启超执其牛耳。国民党与进步党具不可思议之逆命，前清时代则有保皇党同盟会之对

峙，前者采君主立宪主义后者采民主立宪。国体变更后，前者为进步党后者为国民党；现在有宪法研究会及宪法商榷会之对立。关于宪法问题，商榷会主张二院制、省长民选及省制规定，研究会主张一院制，而对于其他亦有反对之主张云。”

1924年谢彬著《民国政党史》，此书为研究民国政党史之必读参考书。这本书的第八章《共和复活时代之政党》之第二节《宪法研究会》中，有如下记述：“旧进步党系至国会复活之际，分组两个新政团，一曰宪法讨论会，以汤化龙、刘崇佑、梁善济、李固珍诸人为其代表党员，二曰宪法研究同志会，以梁启超、王家襄、陈国祥、林长民、蓝公武诸人为其干部领袖。当两派未经合组宪法研究会之初，固各树一帜，不相上下。后汤梁相商，欲对抗宪政商榷会非急行合并，殊难为功，乃于五年八月下旬，实行结合，定名宪法研究会。党员议席约达一百五十名。其政纲主张，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废两制院为一院制……对段内阁取一贯拥护的态度，其党员胥抱渐进主义，训练普遍而周密，故其结合牢固，他党无能并肩于同时者。”^[7]首先，在这里，谢氏对于宪法研究会的成立时间记载有误；另外，他特别提到“宪法讨论会”和“宪法研究同志会”是“各树一帜，不相上下”的（这和我将在以下会谈到的一些史家观点是略有不同的）。谢氏该章的研究，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研究系与段祺瑞的关系。②黎元洪1922年夏秋之交恢复民国元年解散之国会后，研究系的分裂及直系操纵中央政府后，研究系各派情形。③曹锟贿选，宪法研究会“发布新宪纲，世以其素好大言，善投机，遂以阴谋称之……。人谓该系散漫，名存实亡，其实遇大问题仍可合作，其情形正处于貌合神离之反面”^[8]。谢著为早期的研究民国政党史名作，尤其在其书附录《政党解剖》中，他特别地提到了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这在当时政治著作中是仅见的：“五四运动后，研究系三字大为一般人士所注目，盖彼暂时舍目前政权

直接之争夺，而努力文化运动，谋植将来竞争之稳固地盘者也。虽其文化运动之主张，系出一种取巧之政略，而非诚心觉悟忏悔，做基本功夫，以图根本之改造，然视同时国中各政党，固步自封，仍固袭传统之党纲，不知顺应世界新潮为进步者，似稍差强人意耳。三年以来，多方进行；颇具成绩，青年学子被罗致者亦不乏人，其潜势力之继长增高，未有艾也。吾人甚望该系将来重握政权之时，实现现在文化运动之精神，事事以真理为归，一洗从前纵横捭阖，权谋诈伪之风，以间执当今所谓挂羊头卖狗肉者之口，斯为识时务之俊杰矣。”^[9]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谢氏在1924年撰写出版此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尚在开展的时候，他在这本政党史的著作中，特别地提到了研究系与文化运动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表明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实际存在；另一方面也多少以当时的直观，提出了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我们在以下别的章节中会详细加以分析。

同年，《孤军》杂志二卷五、六期合刊载《中国政党小史》，对进步党、研究系记述亦甚详备，并特别提到“自八年五月‘五四’运动后……旧有之政党，惟剩一若存若亡之研究系而已”，作者将研究系看作政党，并且指出五四运动后，这一派力量仍有相对的组织形式存在。

1930年，北京版英文《中国政党》（作者Jermyn Chi-Hung Lynn，凌启鸿）是谢著之外，另一本较早研究中国近代政党的学术著作。在该书中，作者有“研究系”之专章，并将“研究系”名称作如下解释：“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组织‘宪法研究会’，因研究一词，故此新党被称为‘研究系’。”^[10]（原文见书）作者对研究系的渊源、立场及特征均有论述。笔者现将他对研究系的主要认识概括如下：①研究系一贯支持段祺瑞；②研究系是“进步党之儿”、“保皇党之孙”；③研究系与国民党不同，它在北京城外无外围组织；④研究系从不曾拥有过明确的纲领；

⑤研究系之特征乃是“学人政客”(scholar-politician);⑥“研究系由有经验的官员及有迷惑力的政客组成,在共和之前,他们从不放过任何与国民党对着干的机会”。^[11]

1930年,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云:“袁一死……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的进步党人一面力谋与段祺瑞合作,一面却大倡不党主义,并且在权位分配上,表示不与人争……。但国会一开,倡不党主义的进步党人,首先分组两个团体,一个宪法讨论会(以汤化龙、刘崇佑等为首领人物),一个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林长民等为首领人物),‘讨论’与‘研究’不知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原来是一个团体的人,现在却要分组两个团体,难道这就是不党主义么?后来因为他方的旧国民党的复合,有凌驾一切之势,汤梁等自己也觉得分立无太大意义,又结合起来,不‘讨论’专‘研究’了,于是从前的‘进步党’现在变为‘研究系’了,这便是研究系名词的由来。”^[12]首先,在这里,李氏对进步党分组的两个团体名称未作考究;其次,李氏对“研究系”的出现是颇有嘲讽的,以为此不过进步党名义上的游戏,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与谢彬的观点既有相同又有不同。谢以为两个团体“各树一帜”,而李则认为他们并无差异,但谢也承认了进步党人的“神合”。李在该书中,还分析了段祺瑞与研究系的关系,认为段氏的失败开始了研究系在民国政治中的失败。^[13]他还特别地认为梁启超的失意是比段氏来得更强烈的。这也是一本政治史的名著,可能是由于研究专题性质的缘故,全书未提研究系与新文化运动的任何关系。

1931年顾敦柔著《中国议会史》有对研究系的来历作一般说明^[14];1933年罗元鲲著《中国近百年史》讲到研究系亦明指“推梁启超为首领,倡再造共和之说,南方深恶之”^[15]。

1937年,吴虬著《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对研究系的名称由来有不同于一般论著的解释:“段受徐包围,渐与

进步党内之宪法研究会（即世人习称之研究系）接近，谋不利于国民党……。”^[16]在此，作者并不是把宪法研究会作为进步党倡“不党”主义而出现的派系，而是将其视作进步党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的史实和判断，笔者在下章将另有分析。吴氏对研究系评价甚低，认为“研究系对民国之动乱负有责任，并与曹汝霖一样以为‘五四运动遂由林氏一人造成’”^[17]，作者还指出研究系“在国中向有阴谋派之名，始终嫉视革命，虽有‘贤人’之虚名，而军阀则视同名士画饼……”^[18]。同样在1937年，著名政治学家杨幼炯作《中国政党史》，述研究系时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研究系与国民党对立，拥段；②宪法讨论会与宪法研究同志会“初本各自为谋”，后为对抗宪政商榷会而集结；③主张集权主义。该书对研究系并无特别理解，沿用一般解释。^[19]1947年，周异斌、罗汉渊作《中国宪政发展史》对研究系解释亦可见后来史著的标准解释：“与宪政商榷会对立者为宪法讨论会，乃进步党之化身也。按在讨袁期间，旧国民进步两党联合携手，以推倒袁氏，及袁死，进步党倡不党主义。迨国会重开，该党分裂为两，一为汤化龙、刘崇佑、李国珍等所组之宪法讨论会，一为梁启超、王家襄、陈国祥、林长民等所组之宪法研究会，后以国民党各派人结合为宪政商榷会，遂于五年八月末合并，名曰宪法研究会，是即为研究系之所由来也。”^[20]当然，在民国时代的报章杂志各类文章中，提到研究系人及事者尚有很多，如胡适书信、日记及《梁启超年谱长编》、《向导》等。但因为这些资料并不是专门著作，所以在此不再列举，但恰恰因为这些零散的记载，又使笔者得以找到研究系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基本线索及史料。这些笔者在后几章中将会提出。

二、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研究系研究的概况

40 年代，著名记者陶菊隐作《蒋百里传》，虽然这不是一本政治与文化史的专书，但由于蒋百里与研究系颇有渊源，因此在该书中，作者一方面提到蒋百里并非研究系，另一方面也指出，“研究系……张东荪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蓝公武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也在北京办《晨钟报》（《晨报》前身），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21]。此书在笔者看来，也算是在对研究系与新文化运动关系作较直接的肯定的著作之一。

50 年代至今，对于研究系的研究，史学界基本沿袭过去的研究系概念。由于对社会主义传播中国史特别重视，因此往往在谈到近代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研究系可在专章里出现，当然，从当时史学界的立场而言，研究系主要被定性为反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敌人等。

1953 年，列文森在其《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中，一方面对进步党分裂为两个团体表示“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辨认出它分裂的基础”^[22]；另一方面，他提到了 20 年代前后梁启超与研究系从事的文化活动（当然，这些都是以梁为中心的）^[23]。

1958 年，林增平主编《中国近代史》认为，重开国会后，“梁启超一派的政客就称为研究系”^[24]。1959 年，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指研究系为“地主买办阶级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伪装社会主义者来反对社会主义”。^[25]这里指的是对 20 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评价。同年丁守和主编《五四时期期刊介

绍》，提到《学灯》“是以宣传新思想闻名，实际上从开始就属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而且其“社会主义研究”专刊亦是“反动刊物”。在这本书的介绍中，一方面，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被作者同意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宣传新思想闻名”，承认研究系从属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把同属于研究系的《国民公报》及《晨报》与《学灯》比较，提出《学灯》比这两者更右倾，质量比《晨报》副刊差得多。^[26]在该书中，作者显然是注意到了研究系与新文化运动这样的问题。但由于他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其“资产阶级立场”及分析《时事新报》、“社会主义研究”的“极端的反动”，因此，对于他提到的所谓《学灯》质量不如《晨报》副刊，立场比《国民公报》、《晨报》更右倾等问题，并没有论证^[27]。同样，1959年丁守和与殷叙彝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中，再次明确地提到了研究系及其宣传机构，认为研究系参与新文化运动是由于它与安福系在政治的争斗中处于劣势而转向文化运动，特别是由于李大钊的帮助，《晨报》改版“增加了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从而使这一版变成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园地”。作者也认为《国民公报》和《学灯》这两种属于研究系的报刊“进行了传播资产阶级教育、文化和科学思想的工作”，但是，结论亦是批判它们“所宣扬的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东西”，“明显地属于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作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左、右翼划分，显然是后来我国史学界较普遍引用的标准：“从胡适到张东荪就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则是它的左翼的著名代表”。^[28]

1961年《文史资料选辑》载华觉明《进步党和研究系》一文。该文对于进步党及研究史实颇有述记，而且特别地提到研究系的一些骨干分子如蒲殿俊、藉忠寅、陈博生等对新文化运动的

贡献。^[29]但同期中有陈叔通之《关于进步党史料的补充》，否认有研究系之存在，指出：“研究系不是党，并不是小集团……乃系反对分子就进步党内所设宪法研究会，指出研究会内某些分子为‘研究系’，乃一种冷嘲称号，意味着书生又是钻牛角尖的。亦有解释为阴谋家。……研究系只是抽象名词，无历史可言……”^[30]由于华、陈二人均历当时历史，因此这种分歧就显得很独特。陈不愿意承认研究系之历史存在，似乎其意包含有不愿与安福系、交通系并称之目的；但另一方面，他的解释与前文所引吴虬著作亦有相同处。我在下文讲研究系渊源史实时会再作讨论。

1962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称研究系“是一个善于玩弄手段的政客团体”^[31]，而1964年台湾丁中江著《北洋军阀史话》基本上也是不准确地把梁启超、林长民所组的团体称作“宪法研究会”^[32]，并据此来述“研究系”之名所由来。这样的不准确显然在前面所提到的民国著作已出现过，而后来我们引述的一些有影响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亦有同样的错误，也许是不经意使然。比如郑家稼作《陈独秀传》，更是简单地说“梁启超派们被陈独秀们称为研究系”^[33]。彭明1964年的《五四前后的研究系》是国内史学界1949年后关于研究系的较早的专题研究，但对研究系之名称由来，也是不甚考究。他认为研究系分子只是“从事所谓学术研究”，他主要地批判了研究系的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公开进行反革命勾当”，对于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表现，惜未详述。而早在1959年，彭明在《简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文中，就不同意将研究系列入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之内，并认为研究系“不但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而且具有封建买办性”^[34]。但是，在1967年，美国出版的两本中国近代史著作对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工作则略有论述，一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一是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